

中國新文學大系

英阿

史料·索引

序 例

阿 英

依照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整個編輯計劃，和史料索引冊所能容納的字數的關係，在這裏，我祇能很簡略的說一點關於本冊編製經過的話。自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雜誌創刊，一直到現在，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在這雖是很短也是相當長的時間裏，很遺憾的，我們竟還不能有一部較好的中國新文學史。能以找到的，不過是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一九三三），和拙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一九三四）而已。這兩部書，後者祇是史料的輯集，前者事實上是不能使人認為滿意的史書。此外，則不過祇是些發表在雜誌上的，和附在總史裏的一些章節的短篇。這裏，可以舉出下列的若干種：

文學革命運動（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末節，一九二三）

文學革命運動（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一九三二）

文學革命運動（周作人中國新文學之源流，一九三三）

文學革命之回顧（郭沫若，文藝講座，一九三〇）

中國新文藝運動（華漢，文藝講座，一九三〇）

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學（高滔，文學，一九三四）

新文壇的昨日今日與明日（鄭振鐸，民衆教育，一九三二）

中國新文學的起來和它的時代背景（阿英，文學，一九三五）

總結中國新文學的短篇文字，事實上是不止於這幾篇，不過就我所見到的，當以這幾篇較多史的成分。其餘可考的還有不少，就中華圖書館協會刊行的文學論文索引三本所載，就有三十多篇。然而我們所有的，祇不過是這些零星的散作而已。至於可以作為這一時期文學歷史意義研究的，也很有幾篇，如雜誌文學關於本題的討論（一卷一期），如隋洛文的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理論與創作），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創造），一九三一年文學導報（左聯機關誌）所刊關於五四文學討論的文字，和胡適後來發表的逼上梁山（一九三四東方一號），也都是可以作為「史料」的。

原先的計劃，在總史的編選上，這兩方面是都預備顧到的。可是在篇幅上，竟不能如願的做，加以一部分很好的，在客觀的條件上又無法選用，如郭沫若諸先生的著作，故祇能選這裏所收的三篇。胡適，周作人，是五四期新文學運動的幹部，所說的經過，自然更為親切，陳子展的一篇，則於史實的提供，頗為豐富。也有「各論」的準備，就是接着再選一些關於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各方面的史料，同樣是由於無法容納，不得不放棄，祇剩下朱自清新詩（一般）等等的題目，在最初擬定的目錄冊上。

二

史料的第二部分是「會社史料」，在這一部分所深認為遺憾的，是關於少年中國學會材料的獨闕。少年中國二十多冊雖全在手邊，但既沒有社章，宣言，也沒有「發刊詞」之類的作品。後來從一九二六年印的上海通信圖書館書目上見到有少年中國運動小冊子，於是急急的去托友人設法。他訪問了許多朋友，總算找到少年中國學

會幹部某先生家藏有此冊，內收學會會章和宣言。但直到全書付印，某先生始終沒有時間將此冊尋出借抄。

少年中國學會和新青年社新潮社一樣，不是純粹的文學社團，是一般文化的組織。與新潮社可說是一個弟兄團體。機關誌有少年中國（亞東），後來又刊行少年世界（亞東）。主要的人物為王光祚，惲代英，左舜生，曾琦等。創造社作家如郭沫若，鄭伯奇，南國社田漢，最初也都是這裏面的社員。後來因宗教問題，引起了思想的分化，學會遂解散，惲代英一行成爲了共產主義者，曾琦等組成了國家主義的醒獅派。

新青年社本來就沒有正式的組織，基本幹部的結合，完全由於思想意志的相同，後來的分化，其因也在此。我們祇要順序的一讀新青年的編目，就可看出在幾年之間，是在怎樣的激急發展，又是怎樣的在和惡劣的環境奮鬥。牠支配了第一個十年的新文壇，更發動了後十年的新的文學運動。新潮與少年中國，不過是牠的輔助刊物而已。經過了這運動的第一期，然後纔有純粹的文學組織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出現，纔有支配着全般文學運動的刊物小說月報和創造。

這兩個會社的史料，搜輯得是相當的不少，文學研究會且收了茅盾的一篇關於文學研究會，是更有系統的說明。創造社方面也找到一篇，無如張資平的曙新期的創造社（現代），王獨清的一篇關於創造社的談話，都不免於有所失，郭沫若的創造十年，敘述既尙未全，也無從節錄。本冊收發刊詩三首，創造者，我們的花園，是爲季刊一二卷首期作的，創造工程之第七日是序週刊，同樣的是可以看出創刊的態度來的。光華書局曾刊有創造社論一書，雖未可作爲信史，然未始不可作爲研究創造社時之參考資料也。

純粹的登載雜文的主要刊物，自語絲始。努力週報附刊的讀書雜誌，和北京大學國學的週刊，國學季刊，都是當時所謂「以科學的方法，從事於國故的整理」的刊物，在舊的文學整理方面，是有着牠存在的重要意義的。詩刊劇刊附載在北京晨報上，當時並沒有怎樣特殊的影響。但後來的新月詩派，在此時期已經逐漸形成，且在不斷的謀着發展，是可以見到的。沉鐘社已經有了陳翔鶴的一篇關於沉鐘社的過去現在及將來，遺憾是未

名社，沒有找到足以說明這個組織的文字。去年，曾設法請該社幹部李霽野寫一篇以補闕典，因值華北事變發生未成。這個組織，雖說人數很少，祇有李霽野，曹靖華，韋氏弟兄幾位，對於中國的翻譯文學，特殊是關於俄國的，如郭戈里，妥斯退以夫斯基，以及新俄文學的介紹，是有着很重大的貢獻的，如沉鐘社之於德國文學一樣。狂飈社也是有相當影響的組織。主要幹部是高長虹，向培良，這裏選錄了一則宣言。

戲劇方面的組織很有幾個，影響最大的，初期祇有民衆戲劇社，後期當是南國社。田漢的我們的自己批判（南國月刊），凡十數萬言，是一篇極好的社史。爲着篇幅的關係，祇節取了其間的重要部分。而有此一篇，已經是很夠說明，故除社章而外，不再增益什麼。其餘如星期評論，解放與改造，每週評論，世界日報附刊，及無從抄錄創刊詞的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民國日報的覺悟，雖非純粹的文學刊物，在文學方面，是盡了很多力量的。聯合改造社雖曾經存在，沒有什麼實際上的成就可言。

說到新文學的反動，在初期是林紓一班人，林紓的一信兩小說，在本書理論與論爭兩集中已經刊載。故此冊祇收第二期胡先驪梅光迪領導的學衡雜誌弁言，和第三期章士釗主辦的甲寅週刊的發刊詞。這些很簡單的史料，自然還不夠說明這些文學團體和刊物，然爲適當的史料難以尋覓，以及此冊數量的有限，事實上也祇能如此了。作家小傳，本來是預備分請各家親寫的，信件印成，華北事件發生，不得不中止，變成了現在的形式。特輯卷裏，所以特地選用陳獨秀胡適兩篇科學與人生觀序，是因爲這一論戰，對於當時和以後的中國文學運動，有着很大的影響。初期的禁書，自非當時完備的禁書記載，然即此也足以想見一班人了。

三

現在說到雜誌的編目。關於這一部分的存在，曾經有過很長時期的考慮，就是有沒有編目的必要。自然，

只爲着檢查的便利，有着索引已夠，不必再來一個編目。就史的意義上講，却又覺得不可少。因爲這些支配着當時運動的典籍，現在已不容易找到。即從已輯集的單本或索引裏可以看見標題，對於這文字所以寫作的動機，和在發表時間上的重要，還是不免於有些茫然的。有了這樣的一個編目，再加上出版期的註明，則一路看來，使從題目上也可見當時文運是在如何的向前發展，好像是在讀一部有系統的文學史書。若是在論戰期內，更可連同對方雜誌編目互看，看雙方如何的在刀槍相敵，各文來路極明。要考察作品在史的時間意義上，編目是非常重要的，而況這些雜誌已難於尋覓？至於單行本的編目，二十年來，我們有的也是很少，按出版先後排列，有如次的各種：

最近文藝出版物編目（蒲梢，星海，一九二四）

漢譯東西洋作品編目（虛白，蒲梢，一九二九）

文學論文索引三冊（中華圖書館協會，一九三二——五）

一九三二出版文藝書目（中國文藝年鑑社，一九三二）

全國出版物目錄彙編（生活書店，一九三三）

全國出版物總目錄（開明書店，一九三五）

一九三四年出版文藝書目（揚晉豪，一九三五）

生活全國總書目（平心，一九三五）

全數八種，純粹屬於文學的還只有四種，貧乏得真是可憐。故本書的編目，除最先兩種已著錄的外，除開原本，可謂毫無憑藉。雜誌編目，是連這兩本也無可借助。比較還給了些幫忙的，祇有一九二六刊行的上海通信圖書館書目。所收書雖不怎麼多，一九二六前的主要新出版物，是大都有的。可惜這個組織，幾年前就已經不在了。

在雜誌單本的編目上，完全是依靠着私人的藏書。不幸剛着手抄寫的時候，個人遭受了非常的意外，雖以未歸得脫，而老父以七十衰齡，竟被繫入獄，家中的婦孺也嘗到了繲綫之苦，書籍不用說是被封鎖了。故當時對於此冊，幾有編不成功的形勢。而又不能停止，故祇得一面從事於老父等的援救，一面抽暇執筆，向各友人，各書店借抄。給予了很大幫忙的，是友人趙景深先生以及趙邦鏗包可華兩先生所辦的永久讀書會（福履里路二七九弄二十四號），館裏收藏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史料書着實不少。直到幾個月以後，纔算有了機會，就自己的藏書，把編目再加以補充，可是半年已經過去了。

在單行本編目上感到闕典的，是專著部分，恐怕有若干的脫漏。我想當時印行的專著，決不止於此數。後來很想去訪問幾個圖書館，一直又沒有機緣。其他方面，主要作品大概不會有什麼脫落。最初的計劃，是連出版在一九二七以後而內容所收是以前發表的作品，也加以著錄，後來感到如此辦法，很難以週到，故又將編進的重行刪去。書內少數單本子目未抄，是因爲原本一時找不到。有的後來找到，但已無法補進了。翻譯部分，虛白蒲梢的輯本是很有用的，沒有這本編目，我想翻譯部分是不會有這樣的成就。

雜誌總目，這裏所收的，共達三百種。詳細的編目，原稿鈔繕好的也有二十種。爲着篇幅關係，到付印時，祇得割棄若干種，如中國青年文藝作品目之類。最使我感到無可奈何的，是此書一部分未經親校，誤植甚多，雜誌目排列格式，亦經排者改動，未能與單本行款一律。預備校時刪去的衍字，亦完全印出。及至編者得知，已無可設法了。此真是本冊最大遺憾，也是編者個人最痛心的事。將來有機會改版，當逐一更正。

索引部分也是一樣。起始預備就編目全部索引，數量上又不可能，不得不將單本詩集的細目除去，只存各冊的總題。繼而又不得不刪去與文學無關的題目。最後更放棄了詩集以外的單本子目。篇名索引自然是更說不上。一刪再刪的結果，現在印出的全書，實際上不過是原稿二分之一，然已超過預定的分量不少。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冊編製的經過大體如此。對於這部書原稿技術工作上幫忙的，有孫孟濤朱哲兩先生，謹附此致謝。

一九三六年二月阿英記

目次

序例……………阿英……………一——八

一 總史

文學革命運動……………周作人……………四

文學革命運動……………胡適……………一一

文學革命運動……………陳子展……………二二

二 會社史料

新青年宣言……………陳獨秀……………五四

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陳獨秀……………五六

新潮發刊旨趣書……………傅斯年……………五八

新潮之回顧與前瞻……………傅斯年……………六一

新潮社紀事……………孟壽椿……………六七

文學研究會宣言……………孟壽椿……………七一

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	七二
文學研究會簡章	七四
小說月報改革宣言	七六
文學旬刊宣言	七八
文學旬刊改革宣言	七九
文學百期紀念號題辭	八〇
兒童世界宣言	八二
關於「文學研究會」	八四
創造社社章	八九
創造者（創造季刊發刊詞一）	九三
我們的花園（創造季刊發刊詞二）	九七
創世工程之第七日（創造週報發刊詞）	九九
創造週報停刊宣言（一年的回顧）	一〇一
創造日宣言	一〇五
創造日終刊感言	一〇六
創造日停刊佈告	一〇七
創造月報發刊詞	一〇九
洪水復活宣言	一一〇
語絲發刊詞	一一二

卷

一

總

史

文學革命運動

周作人

清末文學方面的情形，現在再加一總括的敘述：

第一，八股文在政治方面已被打倒，致試時已經不再作八股文而改作策論了。其在社會方面，影響却依舊很大，甚至，如從前所說，至今還沒有完全消失。

第二，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全盛時期的漢學，到清末的俞曲園也起了變化，不但弄詞章，而且弄小說，而且在春在堂全集中的文字，有的像李笠翁，有的像金聖嘆，有的像鄭板橋和袁子才。於是，被章實齋罵倒的公安派，又得以復活在漢學家的手裏。

第三，主張文道混合的桐城派，這時也起了變化，嚴復出而譯述西洋的科學和哲學方面的著作，林紓則譯述文學方面。雖則嚴復的譯文被章太炎先生罵為有八股調；林紓譯述的動機是在于西洋文學有時和左傳史記中的筆法相合；然而在其思想和態度方面，總已有了不少的改變。

第四，這時候的民間小說，比較低級的東西，也在照舊發達。其作品有學海花等。

受了桐城派的影響，在這變動局面演了一個主要角色的是梁任公。他是一位研究經學而文章方面是喜歡桐城派的。當時他所主編的刊物，先後有時務報，新民叢報，清議報和新小說等等，在那時的影響都很大，不過，他是從政治方面起來的，他所最注意的是政治上的改革，因而他和文學運動的關係也較為異樣。

自從甲午年（1894）中國敗於日本之後，中間經過了戊戌政變（1898），以至於庚子年的八國聯軍（1900），這幾年間是清代政治上起大變動的開始。梁任公是戊戌政變的主要人物，他從事於政治的改革運動，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學方面。在新民叢

報內有很多的文學作品。不過這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學，而是來自偏路的，和林紆所譯的小說不同。他是想藉文學的感化力作手段，而達到其改良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目的的。這意見，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中可以看出。因此他所刊載的小說多是些「政治小說」，如講匈牙利和希臘的政治改革的小說經國美談等是。新小說內所登載的比較價值大些，但也都是以改良社會為目標的，如科學小說海底旅行，政治小說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和其他的偵探小說之類。這是在文學運動以前的工作。

梁任公的文章是融和了唐宋八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聖嘆為一起，而又從中翻陳出新的。這也可算他的特別工作之一。在我年小時候，也受了他的非常大的影響，讀他的飲冰室文集自由書中國魂等都非常有興趣。他的文章，如他自己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講，是「筆鋒常帶情感」，因而影響社會的力量更加大。

他曾作過一篇羅蘭夫人傳。在那篇傳文中，他將法國革命後歐洲所起的大變化，都歸功於羅蘭夫人身上。在這篇文字中，有幾句是：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崙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

彼馬志黎，曠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

因這幾句話，竟使後來一位投攷的人，在論到拿破崙時頗驚異于拿破崙和梅特涅既屬一母所生之兄弟何以又有那樣不同的性格。從這段笑話中，也可見得他給予社會上的影響是如何之大了。

就這樣，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會為目的，而影響所及，也給予文學革命運動以很大的助力。

在這時候，會有一種白話文字出現，如白話報，白話叢書等，不過和現在的白話文不同，那不是白話文學，只是因為想要變法，要使一般國民都認些文字，看看報紙，對國家政治都可明瞭一點，所以認為用白話寫文章可得到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為那時候的白話和現在的白話文有兩點不相同：

第一，現在白話文，是「話怎麼說便怎麼寫」。那時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話，有一本女誠註釋，是那時候的白話叢書之一，序文的起頭是這樣：

梅侶做成了女誠的註釋，請吳美做序，吳美就提起筆來寫道，從古以來，女人有名氣的極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當中的孔夫子，女誠是女人最要緊念的書。……

又後序云，

華留芳女史看完了裴梅侶做的曹大家女誠註釋嘆一口氣說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國的女子，真沒有有再比他可憐的了。……

這仍然是古文裏的格調，可見那時的白話，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後，又繕作白話寫出來的。

第二，是態度的不同——現在我們作文的態度是一元的，就是：無論對什麼人，作什麼事，無論是著書或隨便地寫一張字條兒，一律都用白話。而以前的態度則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話寫。只是為一般沒有學識的平民和工人才寫白話的。因為那時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東西都用古文，則一般人對報紙仍看不懂，對政府的命令也仍將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話。但如寫正經的文章或著書時，當然還是作文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那時候，古文是為「老爺」用的，白話是為「聽差」用的。

總之，那時候的白話，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變的餘波之一，和後來的白話文可說是沒有大關係的。

不過那時候的白話作品，也給了我們一種好處：使我們看出了古文之無聊。同樣的東西，若用古文寫，因其形式可作掩飾，還不易看清它的缺陷，但用白話一寫，即顯得空空洞洞沒有內容了。

這樣看來，自甲午戰後，不但中國的政治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動，即在文學方面，也正在時時動搖，處處變化，正好像是一個時代的結尾，下一個時代的開端。新的時代所以還不能即時產生者，則是如三國演義上所說的：「萬事齊備，只欠東風」。

所謂「東風」在這裏却正改作「西風」，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國初年，那些東西都已漸漸輸入得很多，於是而文學革命的主張便正式的提出來了。

民國四五年間，有一種青年雜誌發行出來，編輯者為陳獨秀，這雜誌的性質是和後來商務印書館的學生雜誌差不多。後

來，又改名爲新青年，這時候蔡元培作了北大校長，他請陳獨秀作了文科學長，但新青年雜誌仍編輯，這是民國六年的事。其時胡適之尚在美國，他由美國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學革命的意見。但那時的意見還很簡單，只是想將文體改變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話，別的再沒有高深的道理。當時他們的文章也還都用文言作的。其後錢玄同劉半農參加進去，「文學運動」「白話文學」等等旗幟口號才明顯地提了出來。接着又有了胡適之的「八不主義」，也即是復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只不過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學哲學各方面的思想，遂使兩次運動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則仍無多大差異處——這是我們已經屢次講到的了。

對此次文學革命運動起而反對的，是前次已經講過的嚴復和林紓等人。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本是由于他們的介紹才得輸入中國的，而參加文學運動的人們，也大都受過他們的影響，當時林紓的小說由最早的茶花女到後來的十字軍英雄記和黑太子南征錄，我就沒有不讀過的。那麼，他們爲什麼又反動起來呢？那是他們有載道的觀念之故。嚴林都十分聰明，他們看出了文學運動的危險將不限於文學方面的改變，其結果勢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動搖不可。所以怕極了便出而反對。林紓有一封很長的信，致蔡元培先生。（見大系建設理論集）登在當時的公言報上，在那封信上他說明了這次文學運動將使中國人不能讀中國古書，將使中國的倫常道德一齊動搖等危險，而爲之擔憂。

關於這次運動的情形，沒有詳細講述的必要，大家翻看一下獨秀文存和胡適之文存，便可看得出他們所主張的是什麼。錢玄同和劉半農先生的文章沒有收集印行，但在大系的文學論爭集裏，所有當時關於文學革命道問題的重要文章，主張改革和反對革命的兩方面的論戰文字，通通收進裏面去了。

我已屢次地說過，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對此，我覺得還須加以解釋：

有人疑惑：今次的文學革命運動者主張用白話，明末的文學運動者並沒有如此的主張，他們的文章依舊是用古文寫作，何以二者會相同呢？我以爲：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的。這意見和胡適之先生的有些不同。胡先生以爲所以要用白話的理由是，

（一）文學向來是向着白話的路子走的，只因有許多障礙，所以直到現在才入了正軌，以後即永遠如此。

(二) 古文是死文字，白話是活的。

對於他的理由中的第(一)項，在第二講中我已經說過：我的意見是以爲中國的文學一向並沒有一定的目標和方向，有如一條河，只要遇到阻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變化，再遇到即再變。所以，如有人以爲詩言志太無聊，則文學即轉入「載道」的路，如再有人以爲「載道」太無聊，則即再轉「言志」的路。現在雖是白話，雖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後也仍然要有變化，雖則未必再變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却許是必得于人生和社會有好處的才行，而這樣則又是「載道」的了。

對於其理由中的第(二)項，我以爲古文和白話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幾年前，曾有過一樁笑話：那時章士釗以爲古文比白話文好，於是「二桃殺三士」爲例，他說這句話要用白話寫出則必變爲：「兩個桃子，害死了三個讀書人」，豈不太麻煩麼？在這裏首先，他是將「三士」講錯了：「二桃殺三士」爲諸葛亮父吟中的一句，其來源是晏子春秋裏邊所講的一段故事，三士所指係三位游俠之士，并非「三個讀書人」。其次我以爲這句話就是白話而不是古文。例如在我們講話時說，「二桃」就可以，不一定要說「兩個桃子」，「三士」亦然。殺字更不能說是古文。現在所作的白話文內，除了「呢」「吧」「麼」等字比較新一些外，其餘的幾乎都是古字了，如「月」字從甲骨文時代就有，算是一個極古的字了，然而牠却的確沒有死。再如「粵若稽古帝堯」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只是由於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不能說是由於這幾個字是古字的緣故，現在，這句子中的幾個字，還都時常被我們應用，那麼，怎能算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只因牠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與不古，死與活，在文學的本身並沒有明瞭的界限。即在胡適之先生，他從唐代的詩中提出一部份認爲是白話文學，而其取捨却沒有很分明的一條線。即此可知古文白話很難分，其死活更難定。因此，我以爲現在用白話，並不是因爲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

(一) 因爲要言志，所以用白話，——我們寫文章是想將我們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的。能夠將思想和感情多寫出一分，文章的藝術分子即加增一分，寫出得愈多便愈好。這和政治家外交官的談話不同，他們的談話是以不發表意見爲目的的，總是愈說愈令人有莫知究竟之感。要想將我們的思想感情，儘可能地多寫出來，最好的辦法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話怎麼說，就怎麼寫」，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獨抒性靈」。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們得到他生病的電報之後，

趕即到東車站搭車到天津，又改乘輪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我們若用白話將這件事如實地記載出來，則可以看得出這是最快的去法前去。從這裏，我和那位朋友間的密切關係，也自然可以看得出來。若用古文記載，勢將怎麼也說不對。「得到電報」一句，用周秦諸子或桐城派的寫法都寫不出來，因「電報」二字找不到古文來代替，若說接到「信」，則給人的印象很小，顯不出這事情的緊要來。「東車站」也沒有適當古文可以代替，若用「東驛」，意思便不一樣，因當時驛站間的交通是用驛馬。「火車」「輪船」等等名詞也都如此。所以，對於這件事情的敘述，應用古雅的字不但達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時間方面也將弄得與事實相符。又如現在的「大學」若寫作古文的「成均」和「國子監」，則其所給予人的印象也一定不對。從這些簡單的事情上，即可知道想要表達現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我們都知道作戰的目的，是要消滅敵人而不要被敵人打死。因此，選用效力最大的武器是必須的：用刀棍不及用弓箭，用弓箭不及用槍炮，槍炮只有射擊力最大的才最好，所以現在都用大炮而不用刀劍。不過萬一有人還能以青龍偃月刀與機關槍相敵，——能够以青龍偃月刀發生比機關槍更大的效力，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萬一有人能够作到呢，則青龍偃月刀在現在也不妨一用的。文學上的古文也如此，現在并非一定不准用古文，如有人能用古文很明瞭地寫出他的思想感情，較諸用白話文字寫還能表現得更多更好，則也大可不必用白話的，然而誰敢說他能够這樣做呢？

傳達思想，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語言，用顏色，用音樂或文字都可以，本無任何限制。我們自己是不懂音樂的，但據我想來，對於傳達思想和感情，也許那是一種最便當，效力最大的東西吧，用言語傳達就比較難，用文字寫出更難。譬如我們有時候非常高興，高興的原因却有很多：有時因為考試成績好，有時因為發了財，有時又因為戀愛的成功等等，假如對這種種事件都只用「高興」的字樣去形容，則各種高興間不同的情形便表示不出，這樣便是不得要領。所以，將我們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照原樣完全描繪出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既很不容易而到底還想將牠們的原面目盡量地保存在文字當中，結果遂不能不用最近于語言的白話。這是現在所以用白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和明末「信腕信口」的主張，原也是同一綱領——同是從「冒志」的主張中生出來的必然結果。在明末還沒想到用白話，所以只能就文言中的可能，以表達其能思想感情而已。

向來還有一種誤解，以為寫古文難，寫白話容易。據我的經驗說却不如是：寫古文較之寫白話容易得多，而寫白話實有時

是自討苦吃。我常說，如有人想跟我學作白話文，一兩年內實難保其必有成績；如學古文，則一百天的功夫定可使他學好。因為教古文，只須從古文中選出百來篇形式不同格調不同的作為標本，讓學生去熟讀即可。有如學唱歌，只須多記住幾種曲譜：如國歌，進行曲之類，以後即可按譜填詞。文章讀得多了，等作文時即可找一篇格調相合的套上。如作壽序，作祭文等，通可用這種辦法。古人的文字是三段，我們也作三段，五段則也五段。這樣則教者只對學者加以監督，使學者去讀去套，另外並不需要再教什麼。這種辦法，并非我自己想出的，以前的作古文的確就是應用這辦法的，清末文人也曾公然地這樣主張過，但難處是：譬如要作一篇祭文，想將死者全生平的生事都寫進去，有時則限于古人文字中的段落太少而不能做到，那時候便不得不削足以適履了。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

白話文的難處，是必須有感情或思想作內容，古文中可以沒有這東西，而白話文缺少了內容便作不成。白話文有如口袋裝進什麼東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東西不裝。而且無論裝進什麼，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古文有如一隻箱子，只能裝方的東西，圓東西則盛不下；而最好還是讓他空着，任何東西都不裝。大抵在無話可講而又非講不可時，古文是最有用的。譬如遠道接得一位親屬寫來的信，覺到對他講什麼都不好，然而又必須回答，在這樣的時候，若寫白話，簡單的幾句便可完事，當然不相宜的，若用古文，則可以套用舊調，雖則空洞無品，但八行書準可寫滿。

(二)因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變動，所以須用白話——假如思想還和以前相同，則可仍用古文寫作，文章的形式是沒有改革的必要的。現在呢，由於西洋思想的輸入，人們對於政治，經濟，道德等的觀念，和對於人生，社會的見解，都和從前不同了。應用這新的觀點去觀察一切，遂對一切問題又都有了新的意見要說要寫。然而舊的皮囊盛不下新的東西，新的思想必須用新的文體以傳達出來，因而便非用白話不可。

現在有許多文人，如俞平伯先生，其所作的文章雖用白話，但乍看來其形式很平常，其態度也和舊時文人差不多，然在根柢上，他和舊時的文人却絕不相同。他已受過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過了科學的洗禮，所以他對於生死，對於父子，夫婦等的意見，都異于從前很多。在民國以前人們，甚至於現在的戴季陶張繼等人，他們的思想和見地，都不和我們相同，按張戴的思想講，他們還都是庚子以前的人物，現在的青年，都懂得了進化論，習過了生物學，受過了科學的訓練。所以儘管寫些關於花木，山水，吃酒一類的東西，題目和從前相似，而內容則前後絕不相同了。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五講——